

學術論文

中、美、日亞太競合情勢：非結構性因素分析

Revisiting the Sino-US-Japan Relationship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Non-Structural Factor Analysis

王宏仁 *Hung-jen Wang*
成功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Kung University

摘要 / Abstract

本文主要探討中美日三國在亞太地區競合情勢中的非結構性因素分析。相較於結構性因素，非結構性因素重視各國因為文明累積、歷史記憶、國內價值體系等等來源，造成彼此在自我認知、區域角色定位、或是對外關係認識上的差異。差異不必然會帶來現代國家之間的衝突，但勢必需要更多對於差異內涵的了解以避免衝突的可能發生，而非僅憑藉一種單一的國家性質認定或是物質力量的評估來預測。本文從美國對於亞太國家的定位與區域秩序的理解、中國與日本對於各自文明歷史上的自我認識與對外關係的認識，從而歸納出三種不同的國家主權觀認識。短期而言，中美日之間的衝突難以避免，除非目前佔有物質優勢的美國能夠擺脫圍堵中國的心態、或是中日之間的歷史宿怨能夠因為妥協而化解；長期而言，日本

對於美國的威脅將勝於中國對於美國，除非美國能夠不再壓抑日本希冀作為一個正常國家的要求。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investigate the role of non-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making of Sino-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contrast with structural factor analysis, a non-structural factor analysis emphasizes the contribution of a country's civilization, historical memory, and domestic value system to one's self-cognition, regional role or particular perspective on foreign relations, all of which constitute one's epistemology different from others. Such difference will not necessarily bring out conflicts or wars among modern states such as China, U.S., and Japan. However, in order to avoid getting involved in the possible conflicts, states need to appreciate each other's differences in terms of epistemology rather than relying on one type of universal definition on one country's national character or its material power. This paper categorizes three types of sovereignty perspective based on U.S. own self-understanding of itself and the world, along with China and Japan's self-views respectively. In the short run, the dispute or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U.S. and Japan is coming, unless the U.S. could give up its containment policy, or Japan could compromise with China to face their old grudge; in the long run, Japan would pose more threat to U.S. than what China might do now unless the U.S. could give up its continuous suppression of Japan's call for being a normal country.

關鍵字：亞太、中國崛起、再平衡政策、東方主義、認知

Keywords: Asia-Pacific, China Rise, Rebalance, Orientalism, Cognition

壹、東亞情勢本質之主客觀認知條件

本文希望探究的是，中國、美國、日本在東亞地區的關係——不論是競爭、衝突、友好，還是合作——到底是一種純粹政治實力的權力均衡結果(特別指涉軍事與經濟力量為主要基礎的權力平衡)，還是同時涉及到一種在歷史記憶與文化思想上的延續性衝擊，即，各國對於自我角色與他國之間關係在由於各自歷史與文化思想上的不同，所造成的主觀認定上的衝突差異。前者表現在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各項均衡理論，包括，權力均衡、利益均衡、威脅均衡等等。後者則表現在近幾年來各種非西方國家所興起的學派或文明意識，特別集中在亞洲國家。¹本文暫且在此將前者稱之為客觀主義的(東亞)認識，後者稱之為主觀主義的(東亞)認識。在藉由討論東亞情勢本質的同時，也必須同時釐清這兩種客觀、主觀認識之間的關係為何，才能夠回過頭來檢視吾人在東亞情勢上的認知是屬於哪一個立場、是否受到此立場的先驗影響，以及某種立場的堅持是否造成與他者衝突的來源。

講究政治實力的客觀主義，與重視歷史、文明思想的主觀主義之間的另一個差別是，前者是空間導向的分析方式，後者則是時間導向。前者長久以來受到西方政治學研究的關注，例如在國際關係、美國政治、比較政治等次領域的研究中，討論國家作為一個理性、有效與內在一致的分析單位的合理性。²雖然在反對將國家作為主要或唯一分析對象的批評意見裡，已試圖把其他行為者帶入政治學研究的議程當中，但其前提條件仍是將該行為者(們)視為彼此具有內在一致性與共享的理性，無形當中已將行為者去文明、去情感化。相對地，行為者除了可以由空間來定義其性質之外，也應該包含時間的成份。這就是本文所呼籲的，吾人對於東亞情勢的

¹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London: Routledge, 2009).

² Helen V. Milner, "Rationalizing Politics: The Emerging Synthesis of International, American, and Comparative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759-786.

了解需要同時考慮時間因素的角色。換言之，不同國家在互動過程當中，個別或彼此之間的互動或關係建立，還會受到歷史記憶與文明思想在時間面向上的延續性衝擊或影響。這種延續性衝擊或影響，不能只是藉由當前主流的斷代史史觀，或是進步論史觀就予以忽視或取代。³因為這樣的結果，會讓我們誤以為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中美日關係，只是一種永恆的、非歷史、去時間、與跨時空的結構性產物，但是實際上可能完全不是如此。

本文並非要完全否定目前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所累積觀察到的各種行為意義。例如，本文同意，我們在中國或日本等亞洲國家身上也會同樣看到對於權力或是利益的競逐行為。但問題是，這些亞洲國家的行為表徵是否就意味著與美國所表現出來的權力或是利益的競逐行為是指涉同一個目的或意義？當中國與日本領導人在公開場合宣示，他們要追求軍事現代化、維護領土主權完整、或是發展經濟建設等等是符合其國家利益的時候，到底只是告訴我們說這個世界上沒有哪一個國家的本質不是如此(也就是，中國、日本、美國沒有不同，東西方國家也更沒有差異)，還是，這是中日兩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的需要之一而已。如果是後者，這是一種從歷史過程中所學習到的生存「需要」。亦即，兩國在歷史上從各自的鎖國政策當中解放，經歷被迫打開國家門戶與西方人相互貿易開始，中日兩國內的有志之士在歷史過程中無不時時刻刻在思索，如何透過與西方國家的交

³ 「斷代史」的史觀，是一種現今吾人或政治學家所熟悉與慣用的時間分析觀點。此觀點藉由過去發生過的重大政治事件，來認識不同時期的相異之處，也預設了在某政治事件的前後階段，必然代表著相異的發展或是政策主張。這放在長遠的線性歷史觀角度上來說，就是一種從落後邁向進步的發展過程；從短期來說，就是代表後一任政治領導者有別於前任的政策主張。前者的例子展現在我們對於某些政治事件所創造出來的一種截然不同的影響，例如法國大革命、羅斯福新政、天安門事件等等；後者的例子則通常是透過民主選舉中的政黨輪替或是改朝換代來實踐，因為每位勝選的候選人，總是試圖宣稱自己當選後的時代將是如何如何的與前一任不同。然而，據研究，亞洲國家所體現出來的時間觀念，提供了更多迥異於上述斷代史觀念的可能性，例如在中國的「蕭規曹隨」的延續性史觀，一直都是展現在目前中國大陸中共領導人的各項政策當中。關於斷代史觀的詳盡討論與批判，見石之瑜，〈中國政治研究的線性史觀〉，收錄於石之瑜著，《政治學的知識脈絡》(台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01年3月)，頁173-200。

往而學得他們在「器物」上的優勢，以至於能夠保存自我僅有的主體性與意識—具體化為文明價值、制度、與傳統實踐。

在實踐上我們看到，中國從自強運動開始，主體意識的反思具體化於「中體西用」的手段；在日本則從明治維新開始，具體化於「和魂洋才」之政策。但無論如何，兩者都是在西風東漸的歷史過程之中，透過一次又一次的教訓與代價，至今仍持續在學習如何可以扮演好作為一個適當的現代國家的角色。比方說，作為一個世界公認的崛起大國，應該要具備哪些基本要素？⁴作為一個正常國家應該要完成何種充分條件？⁵相對的，美國作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主權國家、民主國家、霸權國家，也會有其對於自我在這些國家角色上的認知，並且將之理所當然地投射到對於其他國家—中國或日本—行為預期上。以上這些看似構成國家得以存在的客觀因素，實則受到行為者主觀的認知與實踐而變得不那麼具有客觀性。有鑑於此，本文試圖解構在所謂的客觀因素之下，中、美、日於亞太地區競合情勢背後的主觀因素，包含認知與實踐的部份。本文首先探討美國如何在自我外交政策、亞太策略中已經將經由客觀分析所得來的權力轉移理論，變成是自我主觀認知的一部分；其次，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中國與日本如何在成為現代意義的主權國家之前，就已經對於自我與周邊秩序的關係有所設定，進而影響各自目前在對外或對美關係上的發展。最後，本文根據中、美、日所發展出來的不同自我定位歸納出三種不同的國家主權觀，藉此概念化中美日在亞太競合背後的主觀因素。本文企圖打破單一的物質衡量標準來分析亞太地區中美日三國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所歸納出來的

⁴ 例如，中國知名國際關係學者閻學通的《中國國家利益分析》一書，便是用來定義與回答此問題。身為大國，理應重視「國家利益」。至於「國家利益」包含哪些，則可以用科學的方式分門別類的舉出。閻學通著，《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天津市：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97)。

⁵ 對於何謂「正常化國家」，有不同的定義與辯論。參見 Yoshihide Soeya, Masayuki Tadokoro, and David Welch, *Japan as a 'Normal Country'?: A National in Search of its Place in the World*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三種國家主權觀認知，也僅僅是幫助吾人進入到三種相對性的認知情境當中，並不排除三種認知觀之外的認識論發展存在、或是三種認知在實際案例上的平行共存、相互競爭，或是相互纏繞的影響。

貳、美國的客觀化主觀認知：新興悲觀主義

美國在外交政策的走向上，越來越反應出一種原子式的、系統性的世界觀。原子式的觀念幫助美國將各個主權國家都視為單一的、平等的、行動一致的、並且性質一致的(比如都是自利的)行為者；而系統性的觀念則是預設了如同原子般的國家行為者，會受到外在力學結構的影響(亦即力的平衡與限制)，最後形成一個平衡的秩序關係。這兩種觀念都是因為美國國際關係的學者，特別是結構現實主義者，受到牛頓力學世界觀的影響，而將世界簡化為一個原子的世界，進而幫助美國外交政策決策者可以將複雜的世界簡化為易於了解的空間秩序，暫時免除於了解個別國家之內複雜的文明歷史、政治生態與意識型態價值。⁶這並不是說，美國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天真的以為，世界秩序就是照著如此機械式的方式在進行。而是說，美國外交政策早已經先入為主地將國家的性質(例如自利、權力擴張)、世界的秩序(均衡或是不均衡)，視為普世皆然的現象，遑論亞太地區的情形，也應當如此。這樣的預設，已經將美國傳統外交政策中關於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差距消弭。不論是之前共和黨的小布希總統、民主黨的歐巴馬，到目前剛當選的川普，彼此之間的主張看似南轅北轍，但從其觀看世界或是區域的角度而言，差異並不大：都已經無形當中將世界當作一個實在的空間概念在規劃其外交政策、將亞太地區當作一個外在「對象」在進

⁶ 這就是將國際關係科學化、國家利益客觀化的開始。換言之，國家已經可以從外部結構來理解，不必求於其內部的文化、語言、歷史、決策過程等等主觀因素。此科學化、客觀化過程，肇始於 Kenneth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同時參見董青嶺，〈從中西哲學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創生〉，《國際政治研究》，第 4 期(2014)，頁 59-72。

行研究並試圖改造之。美國基於其國力之強大以及冷戰時期全球布局之需要，有足夠經費與能力將理論與實踐做出結合。從後見之明來看，到底理論與實踐之間孰先孰後已經不那麼重要，關鍵在於某種主觀的認知意識已經無形當中轉變成客觀的事實，好似這個客觀原本就存在。

目前美國對於亞太事務的關注，主要反映在其對於未來中美關係發展的看法上。而這種看法則是從美國國內目前逐漸升起的悲觀主義氛圍之中產生，並且與對於權力變化相當警覺的「權力轉移理論」、或是政體性質有關的民主論有很大的關聯。例如，中國的經濟發展與軍事現代化成就，已經被當作是權力上升的指標，進而造成中美兩大國之間在亞太地區權力轉移的印象或判斷。根據 Richard Ned Lebow 與 Benjamin Valentino 的研究發現，權力轉移理論雖然自 1980 年代以來漸漸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式微，但是已經被許多研究亞洲事務的專家或是政策制定者用來當作理解亞太秩序的基本框架。⁷據此，這些人在看待亞洲未來的安全情況的時候，總是憂心美國與崛起中國之間可能的戰爭或衝突將會隨時爆發。此處問題的重要性不在於權力轉移理論的本身是否真能預測出中美之間未來可能的衝突，而是在於，美國負責亞太事務的政策制定者或專家，已經將此理論的預設視為客觀先驗的事實，⁸殊不知這仍與美國自身在主觀上如何定義國家性質與國家間關係有密切聯繫。根據 Steve Chan 的觀察指出，一個崛起的大國不必然會變成既存霸權的挑戰者。這個「不必然」之所以會變成「必然」，通常都是因為當今的霸權「決定」了崛起國「應該」或「不應該」是一個挑戰者：

一個霸權選擇了去對抗某些，但不是所有的崛起中的或是擴張中的國

⁷ Richard Ned Lebow and Benjamin Valentino, "Lost in Transitio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23, No. 3 (2009), pp. 389-410.

⁸ 這裡需要稍作釐清。根據筆者在美國華府的訪問經驗，來自國防軍事單位的人通常會比來自國務院的人，習慣用權力轉移的觀點來當作中美關係發展的分析起點。國務院的人雖然也會，但更容易流露出對於民主價值的重視。這反映在民主論的實踐問題上，本文稍後會討論。

家，而且這個霸權對於決定既存的國際利益分配是否、多大程度、以及多快調整到足以反應改變中的權力均衡，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一個正在衰退的(霸權)國家就是因此去發動所謂的預防性戰爭，以免權力均衡的狀況越來越不利於衰退國家本身。⁹

美國外交政策對於中國崛起的認知恰恰就反應出這種「選擇」傾向。Peter Shearman 指出，將中國視為是一個威脅或挑戰者這樣的一個認知，早就支配了小布希政府以及歐巴馬政府以來的中國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權力均衡的事實為何——也就是不論‘客觀的’環境可能會是如何，真相是認知才是關鍵。即便我們觀察到美國官方外交政策宣言中關於中國的部份曾經用了例如像是整合、交往、合作等等的辭彙，但是大多數人所認識到的是，歐巴馬政府對於亞洲逐漸強調的真實動機在於，制衡中國。¹⁰

簡言之，在美國亞太政策中所預設的權力轉移、中國威脅、中國挑戰、權力均衡等等概念，都不單單只是一種客觀狀態下的分析工具，而是美國在認定自身為國際上現存的霸權國家的意識之下，必須也先將任何崛起中的大國，例如中國，定義為威脅，再藉由收集相關的「客觀證據」，去滿足這樣的認知設定。這是一種主觀認知的實踐過程，而不見得是因為中國真的已經對於美國國家利益造成了威脅，所以美國必須要制衡中國。

另一種悲觀主義的根源，則是來自於對於中國政治體制的不滿。雖然中國不能代表整個亞洲，但是當今美國的亞太政策，實際上是圍繞在如何

⁹ Steve Chan, “Can’t Get No Satisfaction? The Recognition of Revisionist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4, No. 2 (2004), p. 105.

¹⁰ Peter Shearman, ‘The Rise of China, Power Tran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sia,’ in Peter Shearman ed., *Power Transition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in Asia: Issues and Challenges* (London: Routledge, 2013), pp. 12-13.

面對中國崛起的勢力之下產生的：¹¹一種是認為要以美國的亞洲傳統盟友為中心而制定的政策為主，例如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的重返亞洲政策。另一種則是以與中國交往為主軸、其他亞洲國家為輔的策略，例如柯林頓時期側重將中國人權問題與經濟發展脫勾，試圖將中國帶入西方國際經濟體系之內來改造；或是小布希任內，與中國在反恐議題上的合作，以及首次與中國高層建立的戰略經濟對話。¹²不管如何，近期在美國的中國觀察家中，有一種對於中國目前政體發展的失望情緒。有兩位中國通的觀察特別值得我們注意。一位是 David Shambaugh (沈大偉)，另一位是 Harry Harding (何漢理)。兩位都不約而同發表專書專文，將此失望情緒做出整理分析，其內容均不脫中國作為非民主政體所衍生出來的治理問題。

沈大偉先在 2015 年 3 月的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上發表了「中國即將崩潰(或垮台)」(“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雖然他事後澄清，並沒有說中國將要崩潰)。¹³該文中，他對於中國未來政權的發展感到憂心，認為習近平上台之後所表現出來的專制治理(despotism)，將會加速中國政治與社會系統的崩解。沈大偉列出目前中國政權所顯露出的五項缺失來支持其論點，在此不多加贅述。但是重點在於，沈大偉認為，這五項缺失若要補救，勢必需要中國進行政治上的改革，而改革的成功，則端賴中國共產黨願意放棄目前所施行的對於社會、各種黨內外聲音的緊縮控制。在其 2016 年的新書 *China's Future* 中，¹⁴沈大偉更將中國政體未來可能發展的路徑，歸納為四種(Semi-Democracy, Soft Authoritarianism, Hard Authoritarianism, Neo-Totalitarianism)，並且將中國目前的發展狀況定義為 hard authoritarianism 類型。在沈大偉的定義裡面，中國的 hard

¹¹ 例如，筆者 2016 年 7 月的華府訪問中，受訪者#11 便提出此分類觀察。

¹² Thomas 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 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5).

¹³ David Shambaugh,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6, 2015), <http://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¹⁴ David Shambaugh, *China's Future*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16).

authoritarianism 雖然可以進行有限的改革(例如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反貪腐運動)，但長久下來，將招致經濟發展上的停滯、加深已有社會問題的衝突，以及讓中國共產黨垮台。對於美國而言，這與中美關係的發展密切相關。原因在於，從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人一直希冀能夠透過與中國正常的交往關係中，讓中國政體朝向民主的方向發展(不管是哪一種定義之下的民主)，並且融入西方的自由體制當中。¹⁵但是根據沈大偉的觀察，從大約 2015 年開始，這種美國對於中國的「幻想」已經破滅，華府開始冒出許多對於中國負面的評價與觀察，並且呼籲美國政府能夠在對中政策上展現更為強硬的立場。

同樣地，另一位著名的中國觀察家何漢理，也在 2015 年於 *Washington Quarterly* 發表長文，將美國過去對華政策的演變做出詳盡的回顧與分析。¹⁶ 該文特別提到，美國目前對於中國「失望」的其中一項重要因素在於，中國大陸在過去幾年不但沒有將其政治體制自由化，反而變本加厲，增加共產黨或是政府對於社會的控制，包括媒體、新聞、大學和非政府機構等對象。某種程度而言，此「失望」的來源還是脫離不了原先對於中國能夠轉變為自由民主政體的期待落空。何漢理或是先前提到沈大偉的觀察，並非只是一種學術象牙塔內的猜測或想像，而是在實務經驗上也獲得證實。筆者在華府訪問期間的受訪對象中，有不少人在情感上是能理解中國的特殊發展經驗與治理需求，但他們均紛紛表示，最近常與中國大陸民間友人接觸的結果，往往得到一種很悲觀、壓抑、甚至是無奈的訊息。例如，某一位相當資深的中國觀察家表示：

從我這一陣子在中國所聽聞的經驗，發現到中國內部，知識界、文藝界、黨內比較低層的聲音，或是就算所聽聞到高層的部份(例如李克強不是

¹⁵ John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 *Foreign Affairs* (January/February 2008),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asia/2008-01-01/rise-china-and-future-west>.

¹⁶ Harry Harding, "Has U.S. China Policy Failed?"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Fall 2015), pp. 5-122.

那麼有權力)、甚至是社會上的中產階級，都有一個共識，就是對於習近平不滿，甚至是到害怕的地步。害怕的部份有兩個，一個是個人的財產(受到限制、無法任意流動或轉移)；一個是個人的人身安全(很多例子看到，公安可以將某個人虐待到死，然後公然說謊去否認)。我認為，習近平越來越集權，而且可以確定的是，習的任期絕對會超過第二任的時間，至少要再一個五年，但問題是，習會用何種形式來達成這目前不得知。比如，還在幕後實際操控，或是雖然下台但仍然掌握重要職位。¹⁷

以上這些觀察可以讓我們了解到，美國各界對於當代中國的認識，不論是從外在結構或是中國內部的政體性質來看，都有一定的角色設定與期待。這其實反映出美國在與他人交往(不論是中國或亞洲其他國家)的國際關係中，有特定的問題意識與認知。相對而言，其他國家是否也用相同的方式在看待自己，或是說，在目前美國這種特定論述框架之下，能否被允許有不同看待自己的方式？下文將利用中國與日本兩個例子作為探討。

參、中日兩國的自我文明史觀與定位

從歷史上來看，中國在面對西方時所自我設定的角色，與日本並不同。這種不同並非從現今的國家疆域劃分而產生的，¹⁸而是由於各自所主張的文明來源、中心與邊陲位置、以及文化正統性的宣稱所造成。本文之所以要從過去歷史、文明的角度來檢視亞洲國家的自我認知，主要原因在於本文認為，亞洲國家目前的「國家」、「主權」等概念，無一不是學習而

¹⁷ 2016年7月華府訪問，受訪者#20。

¹⁸ 現代國家主權的成立，主要是由於歐洲各貴族在宗教改革之後，因不滿必須用放棄財產權與現有管轄土地的方式來與羅馬教廷交換宗教自主權，而造成了三十年戰爭(1618-1648)。戰爭結束之後簽訂了西伐利亞條約，才確立了主權的獨立性、最高性與絕對性。詳細的歷史脈絡，參見 Jens Bartelson, *A Genealogy of Sovereign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來的。¹⁹因此，沒有理由認為，舊有的文明概念就因此毫無影響力，甚至消失。至於傳統的觀念多大的程度影響到目前的國家行為、或是如何與現有的「國家」或「主權」等概念共存，是一個實證上的問題。²⁰

以中國而言，中國試圖回到一種文明的中心地位，是一種文明優越感的再現。²¹這種文明優越感不必然會造成如同西方國際關係理論中，結構現實主義所宣稱的，會有一種向外擴張的野心。因為，前者強調的是心理因素的滿足，而後者則是重視物質力量的擴充。²²在中國帝王時代的確有提及「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等概念，但這些想法卻也同時受到另一極端概念「夷夏之防」的牽制。換言之，中國自西周以來所發展的天下觀念以及對於中國的自我認識，除了是一種方位、疆域概念之外，它還有很清楚的內外層次分際，藉由文化的進步與否來區分你我。這種區分其實是相當主觀的，通常仰賴中國天朝自以為是的認可來界定何處、何人可以劃為中國文明之內或之外。²³此外，中國的文化夷夏觀常常所帶來的不是領土擴充的建議，而是夷夏之防的注重。畢竟，領土的取得不是重點，若是蠻夷之地，要送給中國上朝可能還不見得會被接受。²⁴

¹⁹ 參見 Hung-jen Wang, *The Rise of China and Chines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Lanham, Maryland: Lexington Books, 2013).

²⁰ 歷史上，中國人很早就意識到要處理中西文明共存的問題，例如中體西用的提出。在當代，隨著中國的物質力量發展上升，則有所謂的「化西」思想，呼籲如何在吸收西方知識之後，再藉由壯大的「中學中理」，將「西學西理」取代之。參見張耀南，〈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全盤化西」——論「中西哲學比較研究」之「拐點」〉，《北京行政學院學報》，第2期(2009)，頁90-96。

²¹ 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市：中華書局，2014)。

²² 的確，物質力量的擴充也會同時滿足對於心理上的需求。但是，本文認為，物質力量的擴充只能說是心理因素的充分條件，但不見得是必要條件。

²³ 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81)，頁425-478。

²⁴ 這不是說，中國在帝國時期就沒有領土擴充的行為，因為這種對於文化自我的優越感，也會讓古代中國帝王陶醉在所謂「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漢書，卷五十七下，司馬相如傳)。但是，仍有一派，例如孔子，就是持反對的

同樣地，日本也有文化優越感，但是講求的是超越，而不是回到什麼原初的狀態。這也就是為何自中國的明末以來(而不是自中日甲午戰爭開始)，日本已經開始強調其文化上與政治上的優越性(雖然仍是建立在繼承中國傳統價值的認識上)，認為日本自己早就比當時的中國更有資格被稱為「中國」。這就是所謂的「華夷變態」。²⁵另外，日本在與西方早期接觸的過程中，這種「超越」的思想一直被提出。根據陳瑋芬的研究，日本江戶幕府後期著名的政治家、漢學家、蘭學家的渡邊崋山(1793-1841)曾認為，東西方之道的終極為「一」，並且可以利用西洋之道為普遍超越之規範。²⁶日本在傳統文化上受到中國儒學的影響，現代化過程卻是受到歐洲近代文明的觸發。這樣的文明歷史經驗，使得日本在思考自身的角色之時，往往以作為中西方之間的橋樑為使命，一方面要改造中國、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西方，進而取得一種以「世界」的位置來認識中國與西方。²⁷

中日兩國家的文明歷史觀，其實在認識論上挑戰了先前介紹的美國認知。一種當今流行的看法認為，美國責無旁貸繼續在亞洲地區扮演關鍵性

看法，不但認為靠武力征伐四方外族勞民傷財，也不全然認為夷人是需要去改變(因為也改變不了)。參見邢義田，〈天下一家：中國人的天下觀〉，《中國文化新論：根源篇》(台北市：聯經出版社，1981)。

²⁵ 黃俊傑，2006，引用於陳瑋芬，〈由「天下」與「中國」概念的轉型看日本關於國際秩序的度量衡〉，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台北市：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2008年7月)，頁185。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日本的天下觀念從「兩個天下」轉換到「一個天下」。一個天下是包含了中國、朝鮮與日本，日本位居此天下的「中國」。也就是因為這樣的天下觀念轉變，導致日本開始轉化為對於「東亞」、「東洋」概念的認識，在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東亞天下的時期，提出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希望團結東亞國家，一同抵抗西方列強。對此日本天下觀的轉變意義，見甘懷真，〈「天下」觀念的再檢討〉，收錄於吳展良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7)，頁85-109。

²⁶ 渡邊崋山的原文是說：「審天地四方，佈教利國，為唐山所不及。西洋諸國之道即為吾道，二者合一。」引用於陳瑋芬，〈由「天下」與「中國」概念的轉型看日本關於國際秩序的度量衡〉，收錄於黃自進主編，《東亞世界中的日本政治社會特徵》(台北市：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2008年7月)，頁192。

²⁷ 例如，溝口雄三的多元世界史觀。參見溝口雄三，林右崇譯，《作為「方法」的中國》(台北市：國立編譯館，1999)。

的角色。尤其是在軍事方面的介入，美國不但不應該因為中東的戰事而削減對於亞洲軍備的支出，更應該進一步藉著在亞洲的軍事優勢，再平衡(rebalance)因為中國崛起所造成的東亞區域的權力結構不均衡現象。²⁸在此框架設定之下，就不難理解美國為何急需與中國的周邊國家，包括日本、南韓、菲律賓、越南等國進行雙邊關係的加強。尤其在對日關係上，利用 2015 年是二次大戰結束 70 週年的機會，邀請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於 4 月下旬在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發表公開演說。除了象徵意義上代表美日關係在二次戰後來到一個新的轉捩點，也在實質的雙邊關係上加強雙方的軍事聯盟(美日聯合聲明，以及美日防衛合作新指針)與經濟合作(包括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的推動，以及貿易逆差與關稅問題的解決)。從美國的角度來看，這樣的美日合作關係是可以預期的：日本在二次戰後早就成為美國控制的國家，遑論在冷戰期間因為意識型態而利用來圍堵共產中國，甚至在冷戰結束之後因為地緣政治所造成的安全困境問題，使得日本毫無選擇地必須與美國合作。

問題在於，這樣的美日關係，到底是一種真朋友，還是充其量只是一種假朋友關係？²⁹如果說，現今的日本或中國在某種程度上是文明思想的產物，則日本雖然在客觀環境或物質限制上仍必須受美國所控制，但主觀上日本將美國看做將來國家正常化的跳板、或是所謂的將「美國」作為方法來進入世界，則現今的美日關係也最多是一種假朋友的關係。或許「假朋友」這樣的概念在現實主義設定之下的國際政治中並非不常見。但是其

²⁸ 參見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知名國際關係學者 Joseph Nye 接受日本雜誌 *Dispatch Japan* 的專訪內容：“Nye: ‘The US rebalance to Asia is real.’” (May 5, 2015), <http://www.dispatchjapan.com/blog/2015/05/nye-the-us-rebalance-to-asia-is-real.html>.

²⁹ 根據閻學通的「假朋友」理論，假朋友的關係遠比真敵人的關係還不穩定。而所謂「假朋友」，是指雙邊關係中的兩造國家，都以為彼此的相互利益多於相互不利的利益，因而導致關係的不穩定。閻學通藉此形容中美關係在 1995 年之後不斷震盪的原因。反觀美日關係，只看表面的合作是否會把假朋友關係誤以為是真朋友關係？關於「假朋友」理論，見閻學通，〈對中美關係不穩定性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第 12 期(2010)，頁 4-30。

造成的不穩定關係恐怕超出美日彼此原先的預期。當美國新總統川普宣布不再與亞洲國家(包含日本)簽署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以及日本首相安倍在得知此消息後急急忙忙趕到美國試圖挽回的行動來看，早已皆露出雙邊聯盟的不穩定性。同樣地，中國在崛起的過程當中對於尊嚴、對等、民族復興、話語權的強調，都是在試圖重建其在鴉片戰爭之後所逐漸被摧毀的天朝心態。中國是否重視美國霸權對於以上這些心態概念的干涉多寡，更勝於物質權力上的大小考量來界定中美之間的關係，實為另一項值得研究的課題。總言之，判斷中美、中日該是何種關係，不能只靠先驗的理論假設來認定，因為這只會是將某種單方面的認知誤以為該是普世皆準的實踐規律，但實際上並非雙方在主觀認知上有所交集。如果美國只是單方面將中國或日本看做是一個抽象化的現代國家，認為中國或日本同美國或是同世界上其他國家一樣，在本質上都是追求國家利益或是權力最大化的理性行為者，很有可能只是在一廂情願地利用某種單一的現代國家觀念在設定美日關係，也同時在設定中日關係與中美關係。

利用「現代國家」定義下的主權觀點來對待日本或中國，或許只是方便地將現在的日本和中國與他們過去的文明、歷史記憶做分割，以為將國家意義普世化、空間化、理性化之後，就可以方便地瞭解並預測各種國家在任何時刻或情境之下所進行的行為。但是，實際上很可能只是利用錯誤的假設，創造出錯誤的資訊，然後得到錯誤的結論。對於日本學者諸如竹內好以及子安宣邦來說：「二次戰後的『無條件投降』使日本在受害者意識中喪失了反省的能力，加以冷戰期間日本被編入美國圍堵線，不但戰爭的意義和走入法西斯的原因無暇得到適當清理，直到冷戰結束前日本認識世界與亞洲的圖式仍沿襲著三〇年代的帝國主義觀點」。³⁰這樣的看法所反應出來的問題是，日本是不是真的為美國眼中所認定的典型現代化國

³⁰ 引用於莊雅涵，《如何正常，怎樣國家？走進石原慎太郎的國族敘事》(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教學與研究中心，2008年2月)，頁10。

家，仍是相當值得商榷的。如果日本本身在認知自己作為現代國家的意義上，不是單純地如同外界以為是利用國家利益、權力大小、主權完整、領土疆界等等客觀因素來界定，那麼，我們在分析日本在東亞地區的角色以及日本與美國或與中國的關係之時，就必須同時重新理解日本看待自己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同樣的審視也應該適用在對於中國的分析上。

單就面對西力東漸的影響而言，中國與日本似乎有殊途同歸的態度：兩個國家在早期舊體制受到挑戰以致於被迫接受西洋的國家觀念開始，都是以「尊王攘夷」的態度在實行現代化政策。在中國，是維護天下體制所形成的國家觀念，意在藉由西方的「國家」概念來保護原先中華文明之下的一切思想、價值與體制，也同時藉由這個西方概念來抵禦西方勢力的進一步干涉。在日本，同樣是在國家現代化改革的背景下，國家主義的形成是透過啟發皇道思想(即，天皇是唯一神的概念)來動員國民對於國家的效忠，同時希冀排除西方勢力對於天皇制的破壞。³¹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中日之間儘管對於「國家」的概念可能也有理解上的差異，但他們之間的差異可能還小於他們之間共同與美國所代表的公民國家概念的差異。美國所代表的現代國家觀念所揭示的是，國家的誕生是由於主權者維持了國內的秩序，讓疆域之內的國民可以免除自然狀態的威脅—以致於蠻荒恐怖的自然狀態是在疆界之外才會發生的事情)。但是，國家僅僅是公民社會的代理人，一種對於公眾利益如實呈現的機構而已。相對而言，以中國為例，中國對於「國家」觀念卻不是這樣來的。中國有自己對於「國家」概念的認識，而中國早期的「國家」概念認識，雖然也有類似霍布斯的蠻荒恐怖的自然狀態—例如將人比喻為「近似於禽獸」—但是在邏輯推論上，中國並不是重視是否有一個強而有力的國家主權來維持秩序或是保護人民財

³¹ 但是「忠君愛國」與「愛用西洋物品」兩種看似矛盾的態度卻同時存在於日本發展國家主義的過程當中。參見金采洙，〈近代日本國家主義的形成與發展〉，收錄於徐興慶編，《東亞知識人對近代性思考》(台北市：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8月初版)，頁181-228。

產，而是歸功於因為堯舜對於「人倫」的重視，讓華夏子孫可以從「近於禽獸」的階段躍升為「有教之人」。中國自我的「國家」觀念的確也有統治階級的出現，但是社會秩序的維持不是靠「主權」或是上帝，而是依賴每個人對於「禮」、「人倫」等觀念的學習。³²

肆、離散的三種東方主義國家主權觀

到底以上的討論對於我們分析中美日亞太競合的情勢有何關聯？首先，從物質結構的改變來看。流行的西方國際關係理論認為，中國崛起所產生的結構性改變勢必引發結構性的再平衡反應(例如美國的再平衡策略)，以及此結構性改變所引發的地緣政治問題，比如日本等圍繞在中國周邊國家的安全困境問題(例如中國威脅論的提出)。³³但是本文的討論提醒我們，物質結構的改變所造成的影響，不是一種決定性的，而是認知性的，這種認知又必須透過對於過去文明歷史觀點的解讀。對中國來說，中國自身的發展狀況無疑是被中國自身視為等同於抵抗西方干涉的能力，而自身的發展狀況又不能僅僅侷限在中國本身的國家利益增減，而是必須將周邊的發展情況也納入考慮。前者表現在習近平「奮發有為」的概念，後者則形成所謂的生命共同體。奮發有為呼應中國自視在歷史上的光榮成就，而生命共同體則是實踐天下觀中的照顧責任。後者又將日本納入同一個體系之中，希望日本浪子回頭，同亞洲國家一同抵禦西方霸權主義。但是站在日本的角度，當西方勢力引入之後，就已經開始困擾日本的自我認同：到底要持續脫亞入歐，還是脫歐回亞，還是成為東西之間的「橋樑」？³⁴

³² 王健文，《奉天承運：古代中國的「國家」概念及其正當性基礎》(台北市：東大發行，三民總經銷，1995)。

³³ 參見 Andrew Nathan, and Andrew Scobell, *China's Search for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³⁴ Haruko Satoh, "Japan: What Future with China?" In: Lam Peng Er, and Colin Durkop eds., *East Asia's Relations with A Rising China* (Konrad-Adenauer-Stiftung Korea & Japan

根據這些對於結構變化所產生的不同回應，吾人可以歸納成三種不同的以「東方主義」為基點的主權觀，而這三種主權觀又是藉由三種不同的現代國家體制來呈現(表一)：以美國為代表的改造東方主義(公民制國家)、中國為代表的反身東方主義(天下制國家)，以及日本為代表的超克東方主義(天皇制國家)。所謂東方主義式的國家立場，是由 Edward Said 的東方主義衍伸而來。Said 藉由批判的立場來揭露各種西方文學作品中對於「東方」的描述。指出，這些作品其實在無形當中已經將某種特定的西方視角、意識型態，灌輸在這個「東方」的概念當中，以致於任何被貼上「東方」一詞的人事物，都無法逃離這些包含在東方概念下的想像，例如「神祕的」、「奇特的」、「浪漫的」、「落後的」。當這個東方主義概念落實在美國的公民國家體制上，並與普世主義結合之時，便以一種本文稱之為「改造東方主義式」(reforming orientation)的政治立場來對待亞洲國家：一方面基於錯誤的認知而將神祕、奇特的東方等同於威脅(於是需要圍堵)，另一方面又認為這些尚未完成現代化的落後國家需要被改造(於是必須進行交往)。

這對於被指稱是落後的東方代表—中國—則產生出抗拒的心態，進而表現出所謂的「反身東方主義」(reflexive orientation)。³⁵根據石之瑜的看法，反身東方主義出現在當中國一方面接受了西方東方主義者所賦予中國的所有評價(例如落後、封建)，另一方面又利用這些被東方化的文化價值，反過來抗衡西方勢力的一種特殊立場。目前在中國的外交論述中，已經透過各種不同的學習，將早期革命的詞彙換成理性的國家利益概念，專注在發展綜合實力，以及走和平與發展的道路等等。³⁶但是在追求成為西方所認可的大國同時，國內又有一股力量開始回到中國固有的文明歷史資

Office, 2008), pp. 181-216.

³⁵ 此概念由石之瑜所首先提出。參見石之瑜，〈回應中國：「反國家」論述對「東方主義」的歡迎還拒—以周恩來為例〉，《共黨問題研究》，第 26 卷第 12 期(2000)，頁 6-19。

³⁶ Hung-jen Wang, "Contextualising China's Call for Discourse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13, No. 3 (December 2015), pp. 172-189.

產當中去尋找能夠與西方抗衡的價值觀念。³⁷例如，胡錦濤時期所提出的和諧世界，一開始的確只是口號，表達一種相對於中國威脅論的對抗論述，但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國內知識界有系統的援引儒家思想與各種歷史案例，來說明和諧世界的概念其實本來就是中國思想當中固有的核心價值。³⁸

最後，日本的超克東方主義(overcoming orientation)是一種在不斷游移於東西認同之間所提出的解放途徑。在原本東方主義者概念裡面，日本已經自我證明不需要如同中國那樣再進行自我改造，而日本也在現代化的過程當中追求一種完全的西化，理論上來說已經是被完全的東方主義化了。但日本仍有一種身為亞洲國家的認同與責任感，只是這種認同不是被動的去成為那個東方主義者要去改造的對象，而是希望將東方也提升到西方的層次，甚至是一同超越西方。果真能夠「超越」與「克服」東方國家在世界現代化過程中(或是西力東漸過程中)的弱勢位置，則日本也不需要去苦惱到底要認同為東方的一員，還是西方的一份子，因為日本已經可以超越這兩種認同了。³⁹根據竹內好的看法，超克的達成是需要「自我否定」，而中國在面對西方時總是採取過多的抵抗。相比之下，或許日本現代化與西化的成功可以被看做是自我否定的成功，也就成為中日在面對同樣是東方主義立場時的差異性。

從以上的歸納我們得知，當中國在指責西方國家或是美國老是錯誤的將普世原則套用在中國身上之時，並不是真的在批判，而是一種在接受與

³⁷ 例如張耀南、滕祥志等一批內地學者對於中國古代經典思想的重新重視，面對西方思想提出「化西」的策略。即，視西方思維(特別是進化論)只是某種中國循環觀念當中的一個環節而已。參見，張耀南，〈論「大化」之作為「中華共識」：質疑李約瑟《古代和中世紀中國人的進化思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51卷第1期(2014)，頁44-57；滕祥志，〈當代中國思想的重大轉向：經典、格式與道統〉，《社會科學論壇》(2012)，頁190-207。

³⁸ 相關討論甚多，例如朴柄久，〈「禮記」的和諧世界思想〉，《國際政治科學》，第三期(2008)，頁57-70。

³⁹ 關於日本的「超克」思想，參見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初版發行，2005)。

認同西方根源的普世價值基礎上去強調雙方的差異性。相對的，日本雖然表面上是完全西化、完全接受了普世價值，但是國內卻是有一股聲音(尤其是右派)在批判這種普世價值，並且試圖要超越這種有限的普世價值。⁴⁰果真如此，長期而言，中國對於美國的威脅性可能反而還小於日本。因為，中國在面對美國或西方世界的時候，追求的是相互承認差異性而非同質性，日本追求的則是競爭與超越。在政策上，美國重返亞洲中的再平衡策略肯定是錯誤的，也不會因此增進美國所自認為的國家利益。主要原因在於，美國對於中國的不信任，無論是基於體制的差異、發展的差異、或是思維的差異，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中國一種抵抗的需要。相對而言，雖然依賴西方世界的資源讓日本感到安心，但是，文明深處對於超越現狀與克服霸權的需求，將會讓日本持續調整不但對於中國，還有與美國的未來關係。

伍、結論

文本文認為，即便中美日在亞太地區的競合呈現出所謂的權力均衡或不均衡現象，某種程度而言也是受到美國亞太再平衡策略背後，關於權力轉移或權力均衡的先驗預設所造成。這個預設假定，亞太體系與其他區域秩序在本質上並無特殊之處，而國家行為背後的動機與目的與美國本身無異，都是在追求短期的國家利益或是權力。從美國的角度而言，中國的崛起已經令鄰近的周邊國家例如日本感受到威脅，因此，協同美國一起對中國進行圍堵也是必然之趨勢。然而，美國對於中國威脅之認定並不盡然是真的已經面臨到中國的威脅，而是先藉由對於物質力量擴張的定義，反過頭來認定威脅的來源與對象。這其實深受美國自身在世界體系當中的自我

⁴⁰ 比方說，既然目前西方所宣稱的普世價值其實是西方的實踐經驗，那為何日本經驗不能被抽象為另一種人類普世價值？如果日本可以，那中國也可以，甚至其他國家都有可能。

認知以及對於普世價值、系統性秩序觀念的信仰所影響。從這個角度而言，這是一種主客觀因素相互競爭或相斥的表現。

在中美日的亞太競合分析中，往往忽略非結構性、主觀因素所扮演的角色，以至於無法有效掌握個別國家在結構規範之外的行為。簡言之，各個國家所追求的目標、行動的動機，不是同樣一致地受到一套單一模式所規範，而是還必須考量到歷史上各自在文明表現、記憶、意識型態、價值取向上等等所發展出來的主觀認識上的差異。本文最後歸納出中國以「反身東方主義」為主的主權認識觀、日本以「超克東方主義」為主的主權認識觀，以及美國以「改造東方主義」為主的主權認識觀。三者反應出過往結構性因素在分析亞太情勢的單一與武斷性：中國的反身東方主義讓吾人看到中國在進入現在化國家的行列中，如何在一方面看似被西方社會化的學習過程中，也同時利用西方來批判西方本身對於中國的干涉，並從之中保衛以及建立原有的文明觀；日本的超克東方主義思想，讓日本民族不甘於只是完成國家現代化、成為第一個西方國家中的亞洲國家，還讓日本希冀帶領整個亞洲進入相同的西方世界，所以有大東亞共榮圈的出現。不論是中國的「反生東方主義」，或是日本的「超克東方主義」，都是在與看似客觀的「改造東方主義」對話。從此角度而言，主客觀因素之間是彼此共存，但又是纏繞與相互利用的關係。

最後，美國據稱在 2008 年次貸風暴之後開始國力下降，並且隨著新任總統當選人川普的公開承諾，要開始走回保守孤立的外交政策。這些事實似乎都印證了結構現實主義者之間所同意的，任何霸權國家的權力擴張都有一定的限度。但更重要的是，不管這個限度是肇因於何種地理或是物質因素，都脫離不了國家行為者，特別是其領導人，在主觀認知上的相呼應。在這個基礎上，主觀與客觀因素永遠都是相互共存與纏繞，而非平行發展的。

表一：三種國家主權性質的認知

發展經驗 代表國家	現代國家型態	以東方主義為基點的主權觀
中國	天下制國家	反身東方主義(reflexive orientalism)
日本	天皇制國家	超克東方主義(overcoming orientalism)
美國	公民制國家	改造東方主義(reforming orientalism)

責任編輯：郭佩儒、賴郁璇